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Distr.  
GENERAL

TD/422  
14 February 200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十二届大会

阿克拉，加纳

2008年4月20日至25日

临时议程项目 8(a)

加强全球各级决策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  
减贫的一致性，包括发挥区域方针的作用

全球化、发展和减贫：其社会和性别层面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一、导 言

1. 市场推动的全球化已是生活现实。全球化已影响到所有经济体，无论穷富。近几年来，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全球贸易和金融一体化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涵盖了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商品、服务和金融工具。结果是，国际竞争加剧，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使所有经济体都受到源于全球其他地方的事件和政策产生的影响。

2. 气候变化问题为全球相互依存增加了新的因素，对全球的决策者提出了重大挑战，他们必须调和减贫和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矛盾。随着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相互依存与融合程度的加深，扶持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政策——以及国

---

\* 本文件因处理延误而在上述日期提交。

家、区域和国际决策——变得日益重要。这就需要加强全球经济管理，包括充分的社会和发展内容，考虑到贫穷和性别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审查最有效利用国家政策工具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情况。

3. 过去 25 年来，占主流的共识是以自由市场和灵活价格为核心。当今世界，各国和各区域之间收入与生产能力存在巨大差距，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复杂挑战，这种共识是不够的。必须在新现实的基础上形成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实际远见，这种新现实要求在开放的全球市场、民族国家的主权、法治以及相关的国际规章和行为规范之间实现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平衡。贸发会议愿意通过其研究和技术援助为建立这样一个新共识发挥作用。

4. 本说明是朝向这一目标的一个步骤。它回顾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积极经济发展(第二章)，审查了这些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挑战(第三章)。在这个基础上，本说明最后审查了有哪些政策可为各国选择，以减少全球金融危机风险，促进全球贸易和生产体系更好的融合，并鼓励通过促进实业部门投资，提高和保持经济增长率。本文还讨论了这类政策与减贫的联系以及其性别内容(第四章)。

## 二、全球化与经济发展

5. 自 1996 年在南非米德兰特举行的贸发会议上一届关于非洲大陆的大会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总体业绩和追赶最富裕国家的能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改善。

### A. 高经济增长率

6. 网络泡沫终止以来，世界经济的复苏几乎刺激了所有区域和国家的增长。虽然绝对收入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但发展中国家在 1996-2006 十年期内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 62%，而 7 国集团仅提高了 27%。尽管巴西、阿根廷和一些较小国家由于金融危机严重受挫，但拉丁美洲的实际收入增长了 33%，非洲增长了 50%，转型经济体增长了 60%。在全球复苏开始五年之后的 2006 年，132 个发展中国家当中只有 6 个出现了实际收入下降，而 2000-2005 年期间实际收入下降的国家为 8 个，此前五年是 18 个。与此同时，增长的波动幅度已经大大降低。

## B. 创纪录的出口水平

7.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不仅得益于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出口的迅速增长，而且得助于发展中世界本身一些规模巨大和增长迅速的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强大和日益增长的进口需求。从 1996 年到 2006 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出口增长了一倍多，G7 集团的实际出口增长了三分之二。

8. 中国和印度进口持续增加的主要受益者是较发达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国(即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石油和矿产品的出口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包括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长对出口价格和数量均有积极影响。世界贸易增长的一个特征是初级商品和制成品的南南贸易迅速增长。但是，应当承认，制成品南南贸易的增长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主要在东亚，制成品南南贸易统计量上升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东亚区域内最终向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分工生产和转口而发生双重统计所造成的。

9. 从贸易统计数据看，初级商品南南贸易的增幅较为一般。但是，这种贸易涉及的国家数目，多于制成品南南贸易有力增长涉及到的国家。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借助初级商品南南贸易，赢回了在 1980 年代失去的、在南南总贸易中原有的部分市场份额。对亚洲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商品南南出口不断扩大，这确实有可能演变为最具活力的特征。

10. 出于多种原因，促进南南贸易能够有助于在发展和减贫中取得进展。第一，发达国家对涉及发展中国家出口利益的产品仍然设置贸易壁垒，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均能从更多地注意相互间市场中受益。第二，亚洲高速增长经济体的规模巨大，加上其它地方的区域一体化，减少了发展中国家为了获益于规模经济而争取发达国家市场的必要性。第三，继续依赖于发达国家市场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压力：要想使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准入得到改善，就必须作出有约束力的承诺，包括迅速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保护知识产权、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开放政策。较一般而言，这种依赖会使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面临受到更大挤压的风险，全球体制融合的实现会更加困难。

11. 外国直接投资与国际生产网络的创立为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几乎没有疑问。相对于其它区域，亚洲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高得多。但非洲近年来也有很大增长，主要是由于许多初级产品特别是石油

和矿产品的需求和价格增长。但就世界整体而言，外国直接投资在数量上的重要性比国内投资小。即使包括不计入固定资本形成的对已有资产的采购，2005年，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比1995年增加了一个百分点，比2000年减少了一个百分点。

12. 与此相比，固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步增长，从2000年的23.6%增加到2006年的26.6%，这表明，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北方的这种形式的资本流入的依赖性比通常所认为的要低。即使在没有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区域，国内固定投资也实现了强有力的增长。

### C. 经常项目的改善

13. 由于有了这种良好的贸易业绩，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在1970年代初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经常项目第一次扭亏为盈，而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则有巨额外贸逆差。在三大区域组可以看到这种转变，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大多数较大的区域分组也可以看到这种转变。从2004年到200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将逆差为6%的南非排除在外)，经常项目顺差几乎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南美洲1995年存在2.5%的逆差，但到2005年转为3%的顺差；2006年，南美洲的顺差为2%，如果不算巴西，顺差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2%。唯一的例外是东欧转型经济体集团，如果不包括该区域的石油生产国的话。

14. 但是，需要指出，这些趋势主要是由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带动的。虽然许多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业绩也有改善，它们中大多数未能显著降低其贸易平衡中的高额持续逆差。

15. 一些年来，随着经常项目的转变和发展中国家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全球资本流动扭转了方向。这主要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依赖初级商品的经济体——出口业绩改善的结果，但在许多国家，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变化提高了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为这一结果发挥了作用。经常项目平衡的转变反映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净资本流入的逆转。与正统理论的预计大不相同，来自较贫穷国家的资本净输出似乎并未限制国内投资。这就需要重新研究关于储蓄、投资和资本流动的作用关系的主要推论。

### 三、对经济发展的威胁

16. 发展中国家更多地融入世界经济潜在的益处以及朝向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受到金融危机风险增大的威胁，根源在于严重和不断扩大的全球不平衡，以及不可持续的恶性竞争的社会和财政影响。

#### A. 金融危机危险

17. 各国要增加或保持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受益，其制造商必须在全球市场中具有并保持竞争力。但是，虽然各国能够同时提高生产力、工资和贸易水平，以改进其整体经济福利，却不能全都提高市场份额或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常常表示缺乏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不但是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而且有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都在努力提高竞争力，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加剧，全球金融危机风险加大。

18. 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2006年为8000亿美元)以及中国、日本和德国的顺差(各国均超过1500亿美元)证明全球一体化进程尚未确定。同时，汇率机制未能为促进经常项目流动发挥作用，主要原因是投机因素影响了国际金融和外汇市场。

19. 在这方面，1996年至2006年一些主要顺差国家实际汇率的变化(基于单位劳动成本)非常明显：只有中国的货币(采取固定对美元名义汇率)对美元有幅度不大的实际升值，而有巨额顺差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瑞士(坚持“自由浮动”汇率)的货币对美元进一步贬值，因此其竞争力加强。

20. 贸发会议《200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表明，一旦各国放开其资本项目，就很难避免“利差交易”形式的投资资本流动，从而无法有序地调整全球不平衡。这就增加了调整工作的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稳定性。对于广泛接受的以浮动汇率作为解决对外支付平衡问题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对冲基金和其他投资者未设保险的借贷是对此提出质疑的主要原因。

## B. 恶性竞争

21. 面临可预见的全球化的威胁，各国政府通过在国家一级的政策使本国生产者取得竞争力，凸显了可称之为“新重商主义”的政策的问题，包括采取措施降低劳动成本(从而减少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保障)以及减轻公司税务负担(从而减少了公共投资和和社会支出可用的资金来源)。如果各国都试图通过这类措施提高竞争力，这些措施不但不会奏效，而且还会破坏收入分配和减贫。

22. 为了制止恶性竞争，一些发达国家呼吁在可实施的贸易规定中纳入社会标准。但要发挥作用，这些标准就必须普遍适用，并以公平考虑为核心。确保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提高转化为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使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受益于低物价，或被用为使其邻居“沦为乞丐”，这至少是同样重要的。

### 框 1. 就业、贫困和人口压力

全球竞争的加剧和竞相提高国际竞争力在许多国家引起失业的担心，包括富国和穷国。但是担心由于全球竞争而失掉工作，就和乐观地认为仅靠市场力量就能保证公平地分配全球化的潜在好处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

在某些消费品市场中，提高低收入国家生产者的竞争力肯定需要其它地区的结构改变，但新兴的南方低工资劳动力对于发达国家就业形势的整体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因为劳动力和固定资本的国际流动规模比通常所认为的要低，这一点与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动不同。此外，低工资国家资本能力提高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主要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是因为新兴经济体国内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也意味着对来自世界其他地区产品需求的增加。亚洲增长动态带来许多初级商品热和价格的提高，为包括非洲和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依赖初级商品的经济体加速增长和增加新生产力投资提供了机会。

在这种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就业的强劲增长，或稳定和略为降低了失业率。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现象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失业虽然程度有限，但对高增长率的反应要迟钝得多。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就业受收入变化影响最大，产量每升高一个百分点，上述两区域的就业分别增长 0.8 和 0.7 个百分点，拉丁美洲则为 0.6 个百分点，北非为 0.5 个百分点。在东亚和南亚，这一数值均低于 0.5 个百分点。区域平均值掩盖了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别。例如，亚洲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迅速扩大，同时极端贫穷大幅度减少。

通过生产性工作吸收失业或未充分就业劳动者是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唯一办法。但是吸收的进程非常之慢。发展中区域的增长未能及时体现在就业中，原因可能在于劳动力众多，增长迅速，加之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在近年以石油和采矿业收入增加为基础实现增长的国家中，对就业的影响也由于这些活动的孤立特点而受到限制。但是即使在正迅速工业化的一些国家中，包括中国，也需要多年的高速持续增长来创造必要的就业机会。

人口高增长率对各国的挑战被低估，而这种挑战往往是不可逾越的，因为许多国家没有取得或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来确保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例如，从 2000 年到 2006 年，最不发达国家整个群体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 3.5%，但该群体 50 个国家中，有 12 国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因此，这些国家的受抚养人比例增加，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减贫。此外，这种人口趋势往往加剧包括农业用地和饮水在内的稀缺自然资源的恶化。人口压力、失业、贫困和环境恶化的恶性相互作用只能通过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协调组合来打破。

#### 四、因应政策

23. 近年来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 1980 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 1990 年代以来许多转型经济体一致实行政策改革、放松市场管制和实行自由化。这个议程的关键词是“调整价格”。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议程是基于下述预期：政府减少市场干预，放开市场力量，会导致更有效地分配资源，这反过来会加速增长，提高工资，增加资本回报率。

24. 但是，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这个正统改革议程，与一些东亚经济体实现的成功赶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没有实现所希望的结果。亚洲的经济体不是依赖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来取得经济发展，而是采取较积极的政策，鼓励生产投资、技术更新和结构转变(框 2)，这一点在几份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例如，1996 年、1998 年和 2003 年)中都讨论过。2005 年出版的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sup>1</sup>承认世界银行以前的结构调整方针有若干错误和缺陷。它承认“改革必须超越增

---

<sup>1</sup> 世界银行(2005 年)。《1990 年代的经济增长——吸收十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效，以促进增长”，并承认“可能需要，比如说在技术追赶方面采取面向增长的行动，或鼓励承担加速积累的风险”（第 10 页）。此外，“政府的自由决定权不能完全不要，所以重要的是要找出可以有效行使自由决定权的办法”（第 14 页）。但是这些办法在不同国家会有很大差别。世界银行 2005 年的研究报告承认没有一套万能的成功政策：“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开放和国内自由化，有多种方式……不同的政策可能产生同样效果，同一政策可能产生不同效果，关键要看具体情形”（第 12 至 13 页）。

25. 确实，政策层面所需要的是从以调整价格为重点转向以调整发展进程为重点。后者包括反思旨在管理金融领域全球经济相互作用的政策，反思以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转变和更持续经济增长的国别经济政策。

## 框 2. 发展中国家的差异

全球化和与之相联系的全球经济变化造福于许多国家，但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并不平衡。自 1970 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减少与世界最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和技术差距，更不要说消除了，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相对或绝对指标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不同国家群体的经验与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同方针有着密切联系。东亚和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国家采取积极产业政策，采取渐进和战略方式与世界经济接轨，而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被怂恿深度和迅速地实现经济自由化。当今多数发达经济体工业化的实现是通过回到有力的保护措施和其他非正统政策的方式；许多迅速发展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道路。似乎有必要质疑经济自由化的一成不变的建议，而应审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其它模式。

中国和印度这类发展中国家目前所走的道路，同日本和韩国在类似经济发展水平上所走的道路相似，即战略性地利用产业和贸易政策以及财政货币政策，鼓励投资新生工业，促进新技术的发展。在有限的时间内，国家能够在保持低工资水平的同时提高生产力水平。结果是，公司得益于竞争力的提高和利润率的增加，这成为进一步投资融资的动力和来源。自从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纠正了 1990 年代的汇率错位以来，这一模式在更多的区域和国家得到充分实施。

#### A. 需要多边金融管理

26. 以竞争性对外汇率贬值和依赖低工资、低税收和高补贴为特征的恶性竞争的结果是有害的。为避免这些后果，恰当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实行国际商定的行为规则，仔细平衡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得失，并由一个国际机构加以监控。

27. 确实，合作性全球货币体系的提议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提议同样吸引人，但国际社会还远未达到这一点。金融领域的合作需要从承认最微不足道的以下事实开始，即任何一个国家的汇率就其定义而言都是一种多边的现象，开放型经济体中汇率的任何变化都会产生外部作用和多边影响。

28. 只要这种安排尚未到位，发展中国家就需要有灵活性，需要有足够的办法来防止外汇的过度波动，因为这将增加长期投资和成功赶超的风险。继严格固定汇率和自由浮动汇率不成功的经验之后，在实行资本市场开放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中间”汇率制度已成了首选。当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时，这种汇率制度可以提供更大的回旋余地，可以将实际汇率调整为更接近国家发展战略的水平。

#### B. 纠正多边贸易体系的不对称

29. 贸易政策可以成为工业化和创造增加值的有效工具。工业化和增长来自效益的增长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它的实现是通过消除收支平衡的掣肘——缺少为进口基本设备和中间生产投入融资所需的外汇，工资消费品不能有效地在本地生产。

30. “平坦竞技场”这个比喻经常被用来形容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和承诺。但是，开放贸易制度对各国的效果并不相同，而对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全体成员国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约束力的规则和承诺很可能意味着对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更为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它们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无法使用今天的发达国家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实现工业化所采用的政策，从而限制了创造就业和减贫的机会。

31. 过去十年来，在进行多边贸易谈判的同时，区域和双边贸易规定蓬勃发展，其谈判领域往往大大超越世贸组织谈判的领域，所达成的协定之严大大超过世贸组织的协定，特别是就投资、知识产权和采购(许多属于新加坡议题)而方言。在各级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决策者们需要决定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进一步缩减本国发展政策空间，以换取发达国家的更大的市场准入。为实现多哈回合面向发展的成果，谈判需要(a) 加强特殊和差别待遇规定；(b) 使发达国家承诺实际削减国内支持和关税；(c) 继续充分使用现有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灵活性，特别是在《服务贸易总协定》(服贸总协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

### C. 纠正生产结构中的不对称

32. 所有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核心都是发展强大的制造业。这表明，制造业实现以产量为基础的持续增长对于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以及最终实现减贫是必不可缺的。

33. 建立基础广泛的制造业为提高生产力和增加收入提供了机会。这种增长潜力在供给方面来自于发展规模经济、专业化和知识，在需求方面，来自于有利的全球市场和价格条件。对于发展尚未开发的具有生产潜力的新经济活动来说，制造业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原因在于，要开始未经开发有巨大生产潜力的新活动，已有的制造业活动所需生产能力比农业活动生产能力所需要的额外适应要少。

34. 过去十五年来，虽然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制成品出口和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显著提高，但出口份额的增长远比增加值份额的增长强劲。发展中区域产业业绩的巨大差别说明了工业活动的集中，但某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南亚和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制造业活动的扩大，使许多初级商品的需求迅速增加，价格迅速提高。结果是，许多财富积累依赖初级商品部门的发展中经济体过去几年来实现了强劲经济增长率，超过历史平均水平。

35. 南亚和东亚的持续增长以及发展中世界其它区域的复苏可能维持对初级商品的需求。但是这些发展没有解决与依赖初级商品联系的根本问题。初级商品价格不稳以及初级商品相对于制成品尤其是发达国家出口的制成品价格下滑的长期趋势继续对依赖初级商品的经济体的出口收入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

且，矿业和石油资源的开采往往具有孤立性，几乎没有前向和后向联系，因此几乎不刺激其它经济部门的增长。

36. 由于这些原因，发展中国家对进一步工业化和多样化决不能沾沾自喜。近期从初级商品收入增加中获得的意外收入为逐步增加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的投资提供了机会，这两者对促进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37. 资源密集型出口经济体必须警惕，不要出现实际汇率的升值。避免助长周期性波动的财政行为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初级商品出口收入很高、经济也因此蓬勃发展的时候，各国应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以防止在资源收入下滑、经济进入衰退时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

38. 对许多最穷国家来说，重要的是为初级商品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对总体上的全球繁荣也是一样。因此，国际社会可本着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考虑在全球或区域层次审查多种机制，借以在较大范围上减少初级商品而不仅仅是石油的价格不稳定性。

#### D. 反思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

39. 历史证据显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各国提高人口生活水平的手段。与此联系在一起的是生产和就业部门格局的大规模变革，从农产品转向工业产品，从劳力密集型活动转向越来越多的一系列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活动。发明创新引起更新和多样化，通常是基于艰苦地不断实验和改正错误的知识积累进程。为实现这一点，投资至关重要，不仅投资于基础研究和开发，而且投资于更基本的工程问题，包括产品和工艺设计。

40. 企业家如果能够有相应的利润预期，就会愿意为这种投资提供资金。促进技术进步还可通过投资于人力资本结构来实现，包括发达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以及技术和职业培训，这有助于防止资本边缘产品的下滑，即使资本不断积累提高资本—劳力比率的情况下。

41. 正统经济政策相信市场能够带来必要的投资和结构变革，与之相反，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特征是更积极和直接地促进这类投资和结构改革。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包括产业和贸易政策，以及旨在推动新兴产业的财政货币政策。

42. 利用产业和贸易政策，即使包括暂时限制进口，也绝不能被视为一种反贸易战略；相反，应视之为推动更有利的贸易一体化的战略。这种战略的意图是鼓励私人投资生产和开发技术能力。两者都是各国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力水平，使生产结构和出口种类多元化的前提条件，使各国出口更多和更有吸引力的产品，增加出口收入，提高进口能力，最终实现更高和更能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反过来又会增加各国实现社会目标的机会(框 3)。

### 框 3. 经济政策的性别层面

虽然人们普遍承认社会政策(例如发展卫生和增加教育投资)影响到妇女，但对经济政策(例如促进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也会具有重要的性别影响这一点的理解就没有那么普遍。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成功地扶持发展新生工业和扩大国际贸易，特别是诸如纺织业等低技术含量产业，往往为妇女比男子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妇女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机会中的份额超过其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具体幅度因区域不同而有巨大差别。

同样地，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生活。住宅通电，接近水井，修好通往当地市场的道路，这些都大大减少妇女用在诸如捡柴和挑水等非生产性和无报酬活动上的时间。节约下来的时间使妇女能够在自然经济之外寻找有偿工作。妇女从事生产性和有偿工作，能使她们更加独立，改进家庭生活状况，降低贫困水平，还有可能附带缓解人口压力。

此外，微型信贷机构主要使妇女受益。这些机构帮助妇女平衡家庭消费开支，开发和维持各类生存活动。但是，微型信贷机构不具有强大的帮助妇女经商并最终发展成正式的小、中型企业的力量。原因是多数这类机构只能提供数量相对较小的信贷，期限较短，利率相对较高，而实业部门投资有赖于大额信贷，期限较长，利率较低。为使妇女开发事业，必须使她们更容易获得正规信贷，包括由商业银行和/或发展银行提供的信贷。

在各个生活领域促进性别平等是道德上的要求，但不让妇女全面参与经济在经济上也是不明智的。这意味着劳动力中一个巨大和有创造力的部分被弃而不用，对可能的产量有负面影响，也意味着潜在消费水平下降，对总需求产生负面影响。促进增长的政策、宏观经济变量的演化以及妇女更好地融入经济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促进两性平等的恰当的政策措施，这既是道德要求，也有经济上的要求。

43. 此外，各国在必要时使用财政政策有效地刺激需求，使用货币政策鼓励低储蓄率和被低估的汇率。在亚洲，过去 20 年来，除了因亚洲金融危机风波而曾经中断外，政策利率(实际或名义值)一直低于增长率(实际或名义值)。对于货币经济，这种意义上的低利率是解释固定资本、增长和赶超投资强劲的最重要的唯一政策因素。

44. 创新投资主导经济体制变革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公司能够为投资找到可靠、充分和成本有效的融资来源。当利润本身成为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时，就最好地满足了这个条件。实际上，如果能够启动投资—利润关联，创新投资产生的利润就能够同时加强公司的投资动力和企业为新投资融资的能力。但是，虽然利润是投资的理想来源，但短期上投资可能还需要有其它来源。这些来源可以包括储蓄，但也包括基于扩张的中央银行政策而通过银行信贷创造的流动资金。为后一种融资来源切实可行建立体制条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未来的一项主要任务。

## 五、结 论

45. 要为发展和减贫取得良性成果，可以决定全球化的形式，各国必须决定如何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把一体化完全交给市场力量是一种选择，但却不一定是能取得最佳经济社会效果的选择。全球市场和任何国内市场一样，能否发挥适当的作用取决于恰当的规则、条例和公共政策，这些有助于实现单纯经济效益考虑之外的目标。

46. 在许多领域，可以确定成功的国家政策空间，可以以有利发展、协调一致的方式决定国际体系的形式。经济越是全球化，就越迫切需要国际商定一个影响市场力量作用的充分的体制和管理框架。全球治理结构的重新定型必须在多边层面上开始，在相互关联的货币、金融和贸易体系领域中。需要努力解决这些体系中的不对称问题，使其更加充分地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47. 此外，区域合作可以成为保护最弱者抵御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和不可预测的冲击的另一个途径。不能指望区域自由化本身带来重大发展成果，但是它可以把合作延伸到货币和金融领域、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就业，从而成为规划创新政策做法的基础。在上述前沿领域有效的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量增长和贸易能力，而且能够加强它们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

48. 最后，在国家一级，过去的成败得失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各国必须确定本国的战略和如何配合使用各种政策，但也出现了一些适应全球化挑战的成功模式。那些在全球增长所带来的机会面前落后不前的国家应仔细审查这些模式。在这方面，务实主义和尊重各类发展政策多样化肯定比坚守经济和社会应如何运作的意识形态信念更合适。宏观经济政策是这样，工业和贸易政策是这样，近期极受重视的增长和发展的体制条件也是这样，包括在减贫和男女平等方面。

49. 没有一个国家选择允许“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一统天下的做法，而政府却不进行多种调控和直接干预。有鉴于此，促进发展的努力应当从重点“调整价格”转移到重点“调整发展条件”。

-- -- -- -- --